

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

疫情视野下的痛与爱

□吕婷婷

在极端情况下,人性会呈现出何种姿态?针对这一问题,无数虚构作品利用末世设定,试图作答,其中包括1995年出版的葡萄牙语小说《失明症漫记》。书中描绘了一场蔓延全球的失明症。面对时疫,人们褪去理性与文明的遮羞布,逐渐为动物本能主导。小说中的医生也感慨:“可能只有在盲人的世界里,事物才能还原成其本来的样子。”

作者若泽·萨拉马戈是当代葡萄牙著名作家,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当过技工、文员、编辑。1995年,萨拉马戈获葡萄牙语文学最高殊荣——卡蒙斯文学奖。1998年,又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些经历及身份背后,他却自我定位为“论文家”,一个通过写小说论述观点的“论文家”。他的作品表现出文学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以寓言为皮,戏仿历史,虚构现实。他总是以尖锐的笔触,抨击具体的政治、社会问题,拷问人性的本质。他也在访谈中戏称,其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搅扰读者,使其不得安宁。

这一文学主张也在《失明症漫记》中得到践行。不少评论称书中人性最卑劣的部分在萨拉马戈的笔下展露无遗,叫人不忍卒读。故事从一个等待红绿灯的司机开始,他突然失去视力,“好像在浓雾里,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该症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迅速传播。在现有医疗知识无法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当局立马采取行动,四处征用废弃建筑,隔离患者及疑似感染者。然而,营内环境恶劣,物质资源缺乏,加之视力障碍,人们连日常生活起居都难以料理。随着隔离人数的日益增多,卫生问题恶化,随地排泄已成常态。所谓文明的法则,在肮脏、混乱的境遇中逐渐消解。负责看守的士兵也对患者缺乏基本尊重。他们不时对这些人随意射杀,甚至有人提出要采取对待患上狂犬病的牲畜那样,将他们全部处死。除却外患,更有内忧。营内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回到霍布式斯克的弱肉强势的社会。投机者携带枪支进入。他们垄断食物,要求各个屋上上缴财物、女人服役,与之交换物资。

像动物一样活着

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指出,疾病对人而言,比性命之虞更可怕的是“去人格化”。单纯死于病痛无损于人的体面,而天花、霍乱等扭曲人面部或躯体样貌的疾病,才是人们真正恐惧的对象。萨拉马戈正是利用疾病,竭尽所能地摧毁文明所珍视的体面,逼人审视人性的本来面目,即原始的动物本能。他在书中多次直接将盲人形容成动物:“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进屠宰场一样,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拥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相互闻着呵气和气味。”“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这种从人到兽的嬗变正是萨拉马戈对开头问题的简易答复。

人体和环境卫生条件的恶化,成为文明人向

动物性堕落的最初表征。文中着重描述了医生一次排泄的经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大便越来越难以憋住,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气味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厕所的大便坑,或者不顾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等一行人刚在检疫营安顿下来,首先意识到的便是卫生问题。此时,为人的耻感尚存,盲人自发排队,摸索着寻找厕所排泄。随着时间流逝,检疫营的卫生环境日益恶化,粪便、污秽成为生活中的日常图景。相比开头得知自己失明表现出的镇定,医生因为清洁的丧失彻底崩溃,甚至失声痛哭。他想象不到自己多么肮脏不堪,也想象不到周围环境多么令人作呕。眼前一片白茫,只是这白色的光线,似乎也散发着恶臭。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的中写道,卫生在文明的要求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我们而言,任何肮脏都是与文明不相容的。我们也把清洁的要求延伸到人的身体。”失明带来的无措、物资匮乏、环境恶化已然彻底摧毁了人的羞耻之心。人不再自我要求,放弃体面,随意排泄。“人变成野兽有许多办法,他想,而这是人变兽的头一个。”

外部整洁的丧失是文明社会裂开的第一道缝隙,随之,建立在抽象理性之上的道德秩序,在无人看管、生存堪忧的条件下,也土崩瓦解。盲人为了获取食物,可以踏着同伴的鲜血前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因为无睹,血液、暴力都不能再激起人们丝毫的同情和怜悯。这使得人进一步向动物转变,饥饿、寒冷和性欲等身体欲求变成了行为的主要动力。在生存的要求下,检疫营迎来了丛林法则的回归。

一帮歹徒拥护携带枪支入内的投机者为首领,依靠暴力在营内建立起强权统治。他们垄断食物等物资,重新分配,要求各个屋上上缴财物与之交换。之后更是恬不知耻地提出让女人服役换取食物。“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为了生存,大家再次放下尊严,用身体满足他人身体的欲望,换取物资再反向满足自身最基本的欲求。“女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喊叫,殴打声,打耳光的声音和命令声响起一片……”萨拉马戈用极其冷酷的笔调记录了歹徒的暴行。这些恶劣行径,都化为留在女性身体上的印记。“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双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每个人都为了生存竭尽全力,在污秽和屈辱中苟且。一个自愿供职发泄性欲的女人,在面对丈夫的劝阻时,回复说:“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活着才是本能,就算是像动物一样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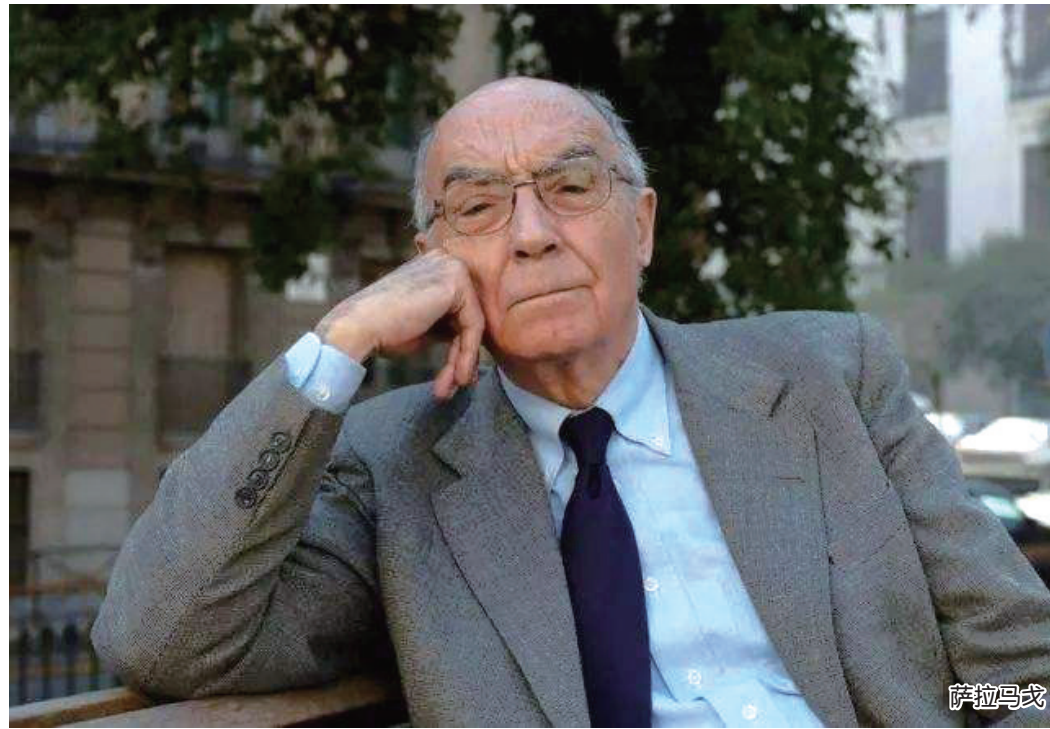


权威的压迫

检疫营中悲剧的发生,不仅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更对外界权威的压迫发出无声的控诉。在我们为人性的卑劣感到悲叹时,请不要忘记,他们是被现代文明抛弃的牺牲品。政府将他们强行隔离,并派遣士兵暴力看管,不加援助,才使其沦落至此。

在《失明症漫记》中,从始至终,政府没有以某一具体的形象出现,只是通过扩音器和盲人们进行着可笑的沟通。它不断强调政府对强制隔离的举措表示遗憾,但这是危机状态下的无奈之举。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尽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认为你们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其他人的行动。”随后颁布了15条训令,呼吁民众遵守规定,自发组建起互助小团体,与政府及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政府开篇明义,反复声称为了公众利益,才制订隔离政策,尽到了政府应尽的责任。然而在现实中,政府派遣军队看管患者,除却每日提供最为基本的物资,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好似患病的事实,清除了病患身为人和公民的基本属性。政府在变相抛弃公民,单方面撕毁社会契约的情况下,却希望盲人们可以考虑团体利益,自我牺牲,维持营内秩序。这种说法,无论作为政府失职开脱,还是单纯对人性的信仰,都显得羸弱无力,不足以让人信服。该通报每日循环播放,此等惺惺作态,不知落在众人耳中,是否会比他们突发失明的事实



更为荒诞?

负责看守盲人的军队,看似是理性意志的执行工具,却表现出对疾病的极度恐惧。为了防止自身不受侵害,这群士兵被刻画成一群漫画式的人物,他们头脑简单,冷酷无情,对盲人毫无怜悯之心,又或是在他们看来,盲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同类。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在现代社会中很少单纯以其本来的面貌出现。“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满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务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这种移植使得盲人们被当作异类,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和污染性。

“他又朝大门方向看了看,紧张地等着看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慢慢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白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

“然后,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还盯着那摊血沿着人行道的小石子之间的缝隙流动。”

由此可见,士兵的强力背后是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非理性事物的恐惧。为了自保,他们一致同意,最明智的解决方式就是将盲人禁锢起来,不让瘟疫危及到他们。对此,军队表现出无情的高效,并对这种高效沾沾自喜。

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上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因为出色地表演了他的好枪法暗自高兴。

面对突然出现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台阶平台上等着的警卫士兵反应敏捷,堪称楷模。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净光。

当有人控诉他们违背人道主义,上士更是毫不避讳地反驳:“何必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上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这些话语也展现了萨拉马戈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在自我保护的要求下,所谓的人道主义

不过是虚伪的假仁假义。

爱与互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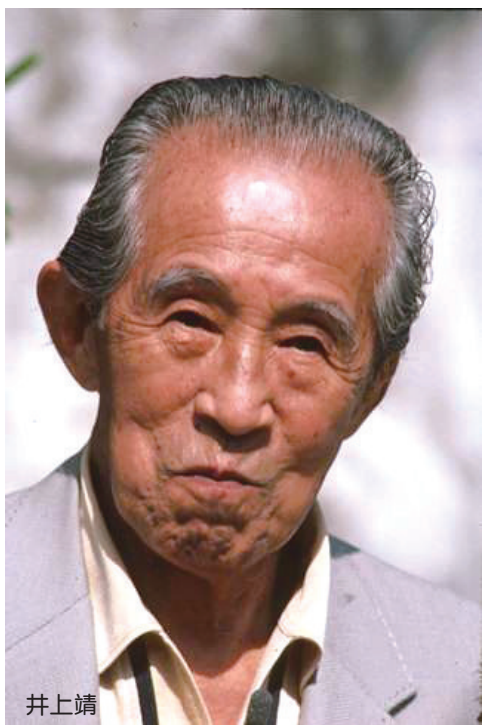
幸而,萨拉马戈在小说中仍保留了一丝共生的可能。在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人们被迫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撑,彼此慰藉。正如那些女人在经受凌辱回屋途中,自发地拉起了手:“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对于有些动作,并不总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医生妻子作为书中唯一的明眼人,也自愿担负起帮助同伴、引领众人的责任。因为她的存在,同屋人幸运地保留了为人最后的尊严。“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完全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宿舍里的其他人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最后也正是在医生妻子的带领下,同屋人凝聚在一起,在互助中求生。他们通过清洁、阅读等手段,试图恢复昔日的秩序,最终一同走出白色的黑蒙。

这恰恰与小说开头形成鲜明对比。在瘟疫到来之前,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礼貌而克制的疏离。萨拉马戈也有意隐去人物的名字,以身份、职业、外貌、性格、经历等特点指代,如“眼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由大概是他的母亲的女人陪着来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这种简化象征着在日常相处中,现代人无需“姓名”这种私人化的交往信息。萨拉马戈在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辞中也指出了这种隔离与疏远:“抵达火星远比靠近我们的同类更容易。”

开篇的箴言书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借助失明症,萨拉马戈创造出可以取而代之的“现实”,让人们睁开眼睛去看,让人们懂得如何去“看”。小说中不乏对人性灰暗、制度冷漠等现实问题的复刻,但结局也预示着,以爱与互助为代表的公社精神,可能是人面对灾难的唯一共存方式。

井上靖佛教题材小说中的僧侣

□李钰



日本近代文学小说家井上靖,是战后派代表作家。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在40岁时发表小说《斗牛》一举拿下芥川奖,从此蜚声文坛。此前,他在每日新闻社担任记者十数载,主要负责宗教和艺术栏目的采访、编辑。44岁,他成为专职作家以后,创作了一系列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其中以西域题材作品《敦煌》《楼兰》《狼》等最为著名。他的这些作品被广为译介出版,为中国读者津津乐道,但鲜为人知的是,井上靖成为作家的第一年创作的是佛教题材小说。第一部便是短篇小说《僧人澄贤札记》。这篇小说还曾被搬上银幕,只可惜因其过度露骨的情欲场景未能将主人公内心对佛的真正感悟传达给观众,电影再创作的失败也直接影响了原著小说的推广。

在井上靖佛教小说系列里,最有代

表性,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便是这部《僧人澄贤札记》。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回溯高野山一位僧人澄贤的一生。澄贤因犯女戒被逐出僧门,他索性放浪形骸,大彻大悟,度过辗转颠沛的一生。澄贤将其对情、对世间烦恼苦痛的感悟融入对佛教经典的解说,编撰了惊世骇俗的《般若理趣经俗译》。最终,澄贤却未能把著作转交给昔日老友宏荣,而是倒在雪中冻死,留给读者一个悲剧式结尾。

井上靖创作以僧侣为主人公的小说绝非偶然,这与他长年担任每日新闻社宗教栏记者密不可分。在井上靖入职那年,他的上司井上吉次郎出版了高野山立川流为题材的小说《文观上人》一书。此书中出现了“澄贤”的名字。而经过笔者深入考究,井上靖的小说《僧人澄贤札记》中的主人公澄贤是真实存在的,他并不是井上靖凭空捏造的“淫僧”,相反历史上的澄贤是位往生极乐净土上的高僧。塑造这样与史实相悖的人物形象,是井上靖惯用的写作手法。井上靖佛教题材小说人物的共同点,是聚焦史料上无名的僧人,他试图通过那些不出名或者是有争议的僧人,折射出时代背景下小人物被裹挟进历史洪流或特定背景中的无奈与坚守,而历史的演进恰恰正是由这些小人物的牺牲堆砌起来的。井上靖以旁观者的视角,用近乎冷酷的客观写实手法展现无名氏们的人生际遇,相较于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小人物的孜孜不弃和奋力抗争,却更加

昭示出作家的人文关怀与创作取向。

那么,作者是怎样将这些“污点”僧人“洗白”的呢?首先,身为小说家的井上靖依靠的是搜集翔实的史料。比如,短篇小说《僧行贺的泪》中的主人公行贺,本就是一名“留学僧”,他在唐三十一年,日日埋头抄写经文,终将不计其数的经卷带回日本,完成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一大宏愿。可谁料到,史实中的行贺由于长期在东土大唐,日语已经相当生疏。在回到日本之后,面对考官的提问,因不能熟练用日语回答问题被训斥为“学识肤浅,徒费国资”之人,他顿时泪如雨下,徒呼奈何。而这些内容的确存在于遣唐史史料,人物和细节都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功绩是将大量佛教典籍抄送回唐,却因为一次考核背上“污名”。如此判定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在井上靖看来是有失偏颇的。于是在小说结尾处写下“行贺晋升兴福寺寺务长官,于延历二十二年圆寂,年七十五。”寥寥数语,似史家者言,表明了作家井上靖对人物命运的决然态度。

井上靖的佛教小说的代表作《天平之鸞》,表面上看主人公是鉴真大和尚,讲述他东渡日本的故事,实则着重描写的是他身边5名留学僧的多舛命运。小说中5名僧人分别是普照、荣睿、玄朗、业行和戒融。天平年间的众多遣唐使中,这5位年轻僧人的际遇,可以说是当时留学僧生存状态的缩影。这5个人无一不是井上靖肆意杜撰之人,荣睿和业行是《续日本纪》鉴真传中最早劝说鉴真东渡弘扬佛法,以图完善日本戒律的东瀛

僧侣。业行的名字在其他书中写为“普照”,普照是5人中唯一成功陪伴大和尚回到日本的人。小说中业行的事迹是虚构的,他被井上靖塑造成为终日专心抄经的僧侣,回国途中和经卷一起沉入海底。玄朗在《唐和尚东征传》中也出现过,但渡航失败后还俗,与一唐女结婚且育有一子,终老于大唐。戒融选择的是用脚丈量唐土,成为了一名托钵僧人。小说题目中的“鸞”,指的是寺庙宝殿上的鸞尾。寺庙落成,望着庙宇两端从大唐运来的“鸞”,厚载着遣唐僧人们的几多风雨与希冀。鉴真这样的大师自然会被人世代称颂,但籍籍无名的留学僧的功绩不应被淹没,井上靖用这5名僧人的故事为后人重塑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遣唐使群像。

短篇小说《补陀落渡海记》讲述的是住持金光坊面对渡海的古老信仰的无奈,在刻板、庄重的仪式后,他在世人的期待中被生生塞进小船,推入大海中赴死,以完成想象中的往生。历史上,金光坊是真实存在的渡海人,但与众多自愿渡海往生极乐净土的僧人相比,他的“不愿意”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的事迹是渡海史上的“污点”。仿佛大众认为的渡海人都应该是一心向往极乐,甘心葬身汪洋大海。但井上靖笔下的金光坊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对于渡海信仰的迟疑,似乎更贴近于读者正常的情感共鸣。

井上靖把诸如澄贤、行贺、金光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污点”僧人拿出来,给他们正名,写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它的意义远不止此,而是将世人眼中的看不到

的另一面写出来。井上靖佛教小说的叙述角度通常是第一人称“我”,而这个“我”也正影射了井上靖自身的无奈,乃至诘问。世人眼中的僧人,先是“僧”,后是“人”;而井上靖以他的作品力图提醒我们:任何一位僧人都是先以肉身凡胎的“人”为根本存在的,忽视了僧侣作为人应有的人性而去评判一个人,要求一

位僧侣以身体完成世俗的期待,是违背人性的行为。违逆人心所做的修行,若不是发自内心,就不是真正的修行。相反,那些历史上的得道高僧,未曾经历凡人所恼,那他们所悟的“佛”理是脱离人伦的,自然也就不是解救苍生之理。所以,井上靖佛教小说中的“污点”僧人,是真正悟得佛法之僧,他们才是值得敬佩的得道高僧。这便是井上靖通过小说最想表达的。井上靖的佛教小说看似神秘高深,但人物鲜活,并不生涩,它跨越国籍,跨越年代,使主人公的情感与每一位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并引起当代的我们反思历史浪潮下无名之辈的功劳。井上靖的佛教系列小说值得细细品读。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